

这是一个人民的世纪

□北京代表团 杨庆祥

自现代以来,青年就不仅仅是一个生理学的概念,它更指向一种热烈的青春气质和丰沛的创造性力量。青年写作的图景,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字的自动表达,而更是一种心灵形式和历史形式,就前者而言,它“内图个性之发展”,就后者而言,它“外图贡献于群”。这两者的综合,奠定了整个中国现代写作的起源和经典谱系,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赵树理、孙犁、柳青、路遥、汪曾祺,这些卓越的创造者正是以一种深刻的“青春性”从历史中获得了形式,并将精神性的光谱,折射进推动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美学构造的实践行为中去。由此,写作不仅是在解释和想象世界,同时也在改造和建设世界。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时序轮回,转眼我们已经站在了21世纪的第21个10年。当代法国哲学家阿兰·巴丢的文章《世纪》开篇就提出疑问:“这是谁的世纪?你们的还是我们的?”我想借用他的这

个提问,来理解我们身处的此时此刻以及此时此刻一个青年写作者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一个商业的世纪吗?资本和利润构成了这个世纪的重要逻辑,在一种高度物质化的语境中,精神性因为猛烈的撞击而变得复杂多变起来。

这是一个游戏的世纪吗?我们得承认,有一种不严肃的虚无和虚拟正在我们的世纪游荡,它嘲笑着正剧,解构着价值,却在患得患失中失去了生活的质数。

这是一个“网红”的世纪吗?多媒体的技术发展以一种即时性的方式参与着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并在这种传播中获得一种可能过于浮夸的存在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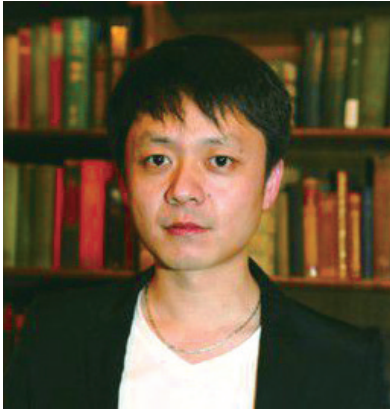
不,这些都不过是居伊·德波所谓的景观化的表象,如果我们的青年写作仅仅停留在这些景观化的层面,就会因为某种内在性和整体性的丧失而失去对话的力量。

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动、迅猛发展的时代,多元并存的文化观和价值观丰富

着我们的认知视野,同时也在以不同的方式拉扯着我们。青年面临着诱惑,青年写作的道路并非一片坦途。

究竟什么才是我们这个世纪的重心?或者说世纪的重心以什么形象呈现其美学和历史的内容?经过长久的思考,我的回答是:人民!是的,这是一个人民的世纪。这里的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和空洞的符号。他们是工厂里的工人、耕作中的农民,他们是脚手架上的务工者,是讲台上的教师,是手术室里的医生,是我在早起和晚归的地铁里,遇到的一个个形色匆忙的上班族。是的,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在神圣劳动的召唤下,为追求人类幸福的自我完成和自我发展而不懈工作的普通人。

这是我们写作的生命之源和精神之源。我曾经在太行山区一个小镇的街头,听到两位母亲用河北梆子高唱她们的人生故事,其时群山肃穆,歌声嘹亮:对生的热切渴望和信任,对世界的直接敞开和表达,用最贴切自我的形式,表达着普遍性



的生命意志。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和真正的中国故事,那一刻,我流泪了。

写作者的力量只可能来自于我们脚下的大地和我们身边的人民。这些年来,我和我的同代人们一直在创作中努力实践这种知行合一的美学观和写作观。我们忠实于自身的经验,同时以一副热的心肠投身于时代生活的热烈和喧嚣,它的阔大和无穷。在前辈作家的注视中,在同代人的和而不同中,我们汲取古今中西的滋养,创造并将继续创造着我们的主体性、民族志和世界语。

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但我们会一直努力。

用真挚的情感书写时代故事

□宁夏代表团 马金莲

我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2000年,18岁的我从当时就读的固原师范学校文学社起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我的文字大多从儿童、女性视角入手,展现中国西部宁夏大地上回汉百姓的生活现状、人生故事和命运状况。对于写作,我始终怀着一颗真挚淳朴的心,坚持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着对现实生活的真挚情感。

这些年我付出了无数心血,但也收获了文学的馈赠。从2004到2007的3年里,我没有工作,在乡下的婆婆家生活,那是一个有着十多口人的大家庭。我成了上面有公公婆婆、中间有四个妯娌的小媳妇。那时候我就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要把这样的感觉变成文字,定格下来。

2010年底,我进了市民盟。女儿跟着我进城入学了,而幼小多病的儿子只能暂时寄养在婆婆家里。从此我开始了每周末都要回乡看孩子的日子。我每次离开的时候孩子都抱着我的腿哭着不让我走,而半夜时分从电话中得知孩子又发烧了,我总是揪心地恨不能长出翅膀飞回去看他。这时候我就注意到,像我儿子一样留在老家和老人一起生活,竟然日渐地变成一种常见现象。年轻的父母外出打工,老人孩子成了留守人群。我就想,我和儿子至少一周能见一次面,而那些打工的家庭呢,有好几个月不回来的,也有一年半载难得团聚的,更有好几年才见上一面的。那些孩子像野草一样在泥土里长着,每当看到他们胆怯而忧郁的目光,我心里有一种疼痛在撕扯,如果他们是我的孩子,我是他们的母亲,我该怎么办?从此我开始大量关注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有空就往附近村庄跑,利用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了解情况、搜集故事、捕捉细节,有一种很强烈的责任感在督促我,得写写这方面的事情。

2012年我开始写第一个长篇小说《马兰花开》,在婆家生活的那些日子,那些故事和细节,那些难忘的片段,排着队往脑子里涌,我感觉自己又回到那样的日子走了一遍。当写到主人公马兰被生活一次次考验时,我觉得我就是那个马兰,她的委屈、艰难让我数次落下眼泪,而她的乐观和积极向上,又让我露出欣慰的笑容。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尝试过长篇小说,但是扎实的生活基础,让这部作品拥有了结实饱满的内核和打动人心的力量。

2013年中篇小说《长河》在《民族文学》首发后,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新华文摘》等多家期刊转载。作品面世以来,很多前辈、朋友、老师、老乡、读者见到我的第一面就说,《长河》写得好,把我们一直都很熟悉但是从来没有认真思考、深入思索过的现实生活和心灵世界给深深地挖掘出来了。这让我认识到,关注现实、书写现实,用深情优美的文字讴歌熟悉的家乡土地和人群,我这样的写作方向是有意义的,也是值得继续坚持的。

去年开始动笔写另一部长篇《孤独树》,也是关注多年的留守儿童题材。小主人公留守乡村,看着爷爷奶奶一天天老去,乡村世界一天天衰落,他的内心日夜承受着亲人不断分离难以团聚的痛苦。因思念而煎熬,因等待而痛苦,孤独像清风、像流水,一天天一夜夜折磨着他的心。孤独的孩子开始种树,他种下了一棵孤独的树,柳树像一个孤独的影子,每天陪着他,每年陪着他。留守儿童在慢慢长大,长大的代价就是,他一天天变得沉默、忧伤、孤僻。他常常坐在树下远望,小小的心灵世界里怀着对世人的模糊认识,对命运朦朦胧胧的感悟。他在等待,他希望跟爸爸妈妈进城,可是他又惧怕,他舍不得爷爷奶奶,他不知道没有自己的日子,爷爷奶奶该怎么过?生活的出路在哪里?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他在思索,爷爷奶奶也在思索,很多人都在思索。作为书写的,我自己更在思索:像他这样在留守环境里长大的乡村少年,他们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命运,又该如何融入这个时代,命运该何去何从?时代的脚步一刻不停地奔向新生活,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是一场孤独的战斗,乡村世界在默默无声地承受着属于这个时代的裂变和疼痛,用孤独抵御孤独,用守望呼唤关爱,用守候温暖心灵。

近年来我家乡实施移民搬迁,这关系到几十万人的生存大计,是大事情。我在密切关注这一历史性的重大变迁,选定一个村庄做跟踪。他们整体离开的时候我去送,他们住的移民点我多次去调研。我最爱去的是搬迁后空下来的村庄,就像一座废墟,我面对着满地瓦砾和黄土、荒草和断路,很多很多激烈的冲击感在脑子里攒动,在心里撕扯,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用文学的笔触记下这些村庄的变迁、消失和那些随着生活的步伐奔跑在大地上乡亲的故事,尤其是大家在生存条件相对落后的西海固地区,为了奔向好日子的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求。

多年写作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个方向:写底层、写现实、写生活。火热而生动的生活总是在最庞大的人群当中,文学的笔触始终贴着他们去书写,才是最正确的选择,也是一个乡村出来的“80后”作家必须担当的责任。



带着诗意前行

□贵州代表团 肖江虹



2013年至2016年间,我连续写了《蛊镇》《悬棺》《傩面》三部小说。三部小说都是以贵州边地民俗民风为题材。这三个作品对我的写作意义重大,它们让我看到了文学更为丰饶和开阔的那一部分,同时也让我找到了汉语叙事的优良传统。我记录这些消逝和即将消逝的风物,不是吟唱挽歌,而是想努力把曾经打动我们的乡村诗意地记录下来,让读者能看到祖先们在遥远的过去曾经拥有的伟大的想象力和诚挚的包容心。

我觉得人类是要一程一程地往前赶的。我们在赶路的时候,会经历很多美好的东西,比如这些传统艺术。我为什么要写这些小说呢?我是这样想的,咱们在一程一程地往前赶,就像我们旅游经过一个地方,有非常好的风景,但是你不能永远停下来来看这个风景,你还得往前走,你转弯、翻个山,这风景就不见了,但是咱们可以记在心里,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累了之后,坐下来,想一下,原来我们在旅途里经历过这些美好的东西。

2016年我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叫做《傩面》,主要讲述贵州的傩面戏。这部小说光田野调查就做了六七万字,比小说字数还多。特别是小说中涉及的大量傩戏唱词,都是傩面师唱一句我记一句,很多段落还得重新加工和梳理。不过我喜欢这种有难度的写作,它能让我更大幅度抵达真实,同时也能让文本获得某种飞升的可能。

我写下诸如《百鸟朝凤》这类小说,不是吟唱挽歌,我只是记录,记录这样一种诗意。人们说民俗代表一种文化,其实这种理解我不赞同,我觉得它代表诗意。唢呐没了,但是唢呐匠精神层面的东西会附着到其他东西身上。旧的艺术形式在不断地淹没于时间轴上,但是新的艺术形式又在不断产生。

比如《百鸟朝凤》里面,唢呐最终是消失了,但它内核仿佛一直都在。我今年年初回到老家,跟一个老唢呐匠聊天,他对这门手艺的消失显得比较无奈,随后他笑着对我说:唢呐可以死掉,但曲子是死不掉的。说完随手摘下一片木叶,送到嘴里,一曲《南山松》依旧高亢嘹亮。

其实所有文学作品所依托的外物只是一个手段,最终的指向还是人。文学就是写人的困境。在精神上,谁都可能成为弱势,这和你的地位、财富是没有关系的。我理解的文学胸怀,就是作家的笔下不该有假想敌,作家应该写出万物平等,写出属于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苦痛。

我们现在的写作,对阴暗、丑陋、垮塌的部分特别得心应手,惟独对美好、善良、悲悯、庄严这些文学的基本要义丧失了感知和构建的能力。你写一团漆黑意义在哪里?如果一团漆黑里没有最后划亮的那根火柴,如何让人看到出路。我们要不断往前走,人类的脚步是停不下来的。停下脚步去盯着那些陈旧的事物,这没有意义,因为我们的目标在前方。但是在行走的时候,不要忘掉这些曾经带给我们美好的东西,它能让我们怀着诗意的美好去继续往前赶。

我在写《傩面》时,去贵州道真采风,那里有位傩面师,做了很多精美的傩面,却要在临死前,把傩面全部烧掉。我痛心疾首。傩面师却很坦然:“和人一样,这些东西该消失的,一定要消失,我都没有那么大冲击,你为什么要痛心疾首呢?”吃晚饭时,他又对我说:“消亡不可怕,没有尊严的消亡才可怕,放下了,才有尊严。”这事对我的冲击特别大,以前我的写作,都在写对抗:城和乡的对抗、文明和非文明的对抗,写了很多剑拔弩张的对抗。通过这次采风,我特别清晰地认识到,文学最终的指向不是对抗而是和解:人和人的和解、人和自然的和解、人和这个世界的和解。

在《百鸟朝凤》中,笔触都在痛点上,好像苦痛越大,文学的获得感就越多;在《蛊镇》里,现代化成为隐在的批判对象;在《悬棺》里,百年的坚守一夜消逝,仍旧在书写渗入到石头缝里的对抗。不过在《悬棺》这部小说中,我开始发现,故乡的前面还有故乡,人类就是在这样的破立之中一路走来。那次采风回来,我又花了很长时间,把《史记》重读了一遍,我惊讶地发现,大学期间读《史记》,一直以为人类史是一部对抗史,现在我才发现,它其实是一部和解史。

感谢生我养我的贵州大地,她的多姿和丰饶一直滋养着我的写作。今后,我会继续讲述贵州故事。作为一名青年作家,讲好了贵州故事,就是讲好了中国故事。

文学的真相

□山西代表团 张二棍

我来自文化底蕴深厚的山西,是一个奔波在山野中勘察、找矿的地质队员。在原野和大地上,我行走了19个年头。这19年风餐露宿,栉风沐雨,我历经无数山河和草木,它们横亘在我从少年到壮年的生命中,成为了我的胎记、我的血脉、我的呼吸与心跳。这种近乎原始的生活和工作,会让一个人对大自然产生敬畏和尊重,会让一个人更加敏感,更加容易动情、动心。也就是在这段漫长而几近乏味的岁月里,我在懵懂中开始了对诗歌的阅读和写作。所以,我觉得我是携带着原野而来的一个人,我现在发出的声音,其实就约等于,大家听到了太行山上的风雪呼啸,某座森林里的松涛阵阵,一把榔头敲击一块山石的响动。

是的,我们都在各自的生活之中,谁都无法避免时空对我们个体生命的塑造与修饰。我们身处一个日新月异无比美好的时代,但在这一切美好的背后,世界依旧充斥着许多别离、伤害、背信弃义、患得患失、争名夺利、心口不一……我们依然被生老病死等等这些无形的事物包围着、裹挟着,甚至吞噬着……对物质的过度追求,并不会带给自己无限的欢愉,反而可能是更大的限制。

而作家的使命,其实就是为所有可能存在的读者,为所有感觉到自己孤单、卑怯的读者,给他们不断松绑,让他们获得一些物质之外的自由与爱。当他们茫然无助的时候,当他们消沉失落的刹那,当他们需要被理解和支持的那一刻……

正是这个不圆满的世界和这些不完美的读者,促使我们拿起了手中的笔,我们愿意在文字中去恢复那些本该完整存在却越来越缺失的东西。我们要发掘人性中最单纯而耀眼部分,我们要记录下泱泱众生,在他们生存中的那些坚强、宽容、救赎、彼此关怀的瞬间,我们要让大家的生命里拥有各自的尊严、勇气与理想。文学具有教化、安慰、鼓舞人心的力量。

所以,越是在一个物质丰饶的时代,作家越要恪守真善美。我们要先行于大众,懂得感恩、感动、感怀……我们也许无法成为道德楷模、良心标准,但我们有义务擦拭自己的笔,让我们写下的每一页文字,都散发出沁人心脾的味道。因为我们的文字,不仅是自我的,更应当是与大众相通的。生活



在这滚滚人海中,我们看见无数晃动的人脸,他们是清晨4点钟马路上的清洁工、带着命令彻夜蹲守在街角的警察、烈日下两手空空的拾荒人、垂头丧气的小老板、满头大汗的外卖哥……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我们生活在他们之中,看见他们繁复庸俗的日常,感受着他们朴素的爱恨情仇。

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还会写下些什么,但回望自己写过的那些作品,我看清了自己的渺小与不足。大地上的事物太多,而我们能够目睹的太少。谁也没有能力去穿越时空,去经历一切,阅读一切,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度过更加宏大的、深邃的、辽远的一生。而文学可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拥有无数生命的人,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笔下,自由穿梭,我们可以用一千张嘴、一千双耳朵、一千个灵魂,去抒发表达自我。所以,我期待与大家一起,用我们奇妙的语言,书写这个时代的浩瀚与博大,书写人民的朴实与勤劳。

我个人的写作,其实就是在一遍遍的盲人摸象。在现实与自我之间,还存在一个“摸”的过程,以及摸过之后内心的理解,以及理解之后的表达的局限。经过这一番行动之后,那个“现象”或者说现实早已经消失了,它在我内心经过千变万化之后,在我试图理解之后,在我自以为摸清之后,在我说出口之后,它幻化成另外一种物体,甚至是一种变异的崭新的物体。这也许正是文学让人着迷与欲罢不能的地方吧。作家大概都是用自己的偏执与短视,用自己的无知和鲁莽,用自己的猛药和土药方,来写作、来求解、来误解。因而,作家也可能不是正确的、完美的、有答案的,而是一群在矛盾中寻找悖谬的人,应该是在貌似完美中不断寻找破损的部分,然后告诉人们要修复的人;是在所有人的异口同声里,泪流满面摇着头说不,而给人以光的人。

写出有格局的作品

□上海代表团 王苏辛

作和生活。上海是一个包容且多元的城市,我在这里既看到江南地区的烟火气,更能看到一个个纷繁的新生事物,有很多人率先在上海落地生根。许多生活在上海的作家,包括诸多优秀的翻译家和出版人,既持续书写着新的上海故事,同时又超越了这个地域,他们的眼界是全国性的,甚至是无国界的,以及试图贯通古今,用自己的写作直接回应21世纪人类的精神问题。

不管是我小时候感受到的那个菱形玻璃,还是现在在城市中看到的这些细节,都让我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它早已经是一个打通边界的时代。即使在城市中,也能看到一条很像县城里的那种窄窄的街,而即使在县城里,我们也能看到最新款的电子产品,听到有些年轻人说着很标准的普通话。所有这一切跟我们日常打交道的事物,都包裹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如果我们理解其中一个,那必然要把其他部分一起理解了。

与之相应的,是很多人,尤其是我们这一

代人,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建立和重构自己的精神世界。各种领域的信息冲进来,形成各种复杂的声音。每一条信息都清晰,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却变得含混。我们甚至根本没有机会,在同一个语境中游荡太久,我们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方言,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外语。所有的写作者,都正在成为着没有真正故乡的人。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描写当下的文学作品,里面有很多是非常优秀的。但大多数作品依然是用前辈作家们留下来的已有的文学经验和社会经验在书写,依然没有直接以自己的方式面向当下的各种新生事物,面对当下这个交融中的21世纪。不少文学作品和这个时代本身相比较,是较落后的,这是不对的。我们不可能再回到一个属于过去的文学黄金时代,不可能再回到一个世纪,但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这个世纪的语感,让作品的质地区别于已被无数文学经典所展示过的那个世界,感受信息时代独特的厚度。过去的经

典当然仍是经典,但依然在过去,我们应该有书写这个世纪经典的理想。一个作家,他应该有即时性的捕捉能力,更应该有意识培养自己作品的前瞻性。不止写出菱形的一个面和两个面,而是直接写出所有面交叠以及整块菱形玻璃的厚度。

现在这个世界,各个不同群体之间的界限已经不似过去那般明显。在一个被互联网包裹着的、逐渐消融边界世界中,面对滚滚而来的信息,怎么在信息流积累起来的虚拟厚度中,用自己的方式,书写它独特的真实?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和21世纪以前那些人的精神世界,究竟有什么不同?或者说,如何准确地书写一个真正打开的21世纪。

这就是我所认为的青年作家应该写的东西,可能现在写不出,但理应把它视为自己的抱负,只有写出这样厚度的作品,文学才能真的拥有意义。感受多维的信息时代,并写出它的变化,紧跟时代,甚至不再只是看到一个地方,看到一座城市,看到中国,看到世界,而是看到整个人类的发展方向,看向宇宙。我相信,未来的作家,未来文学的竞争,可能会是宇宙观层面的竞争。而写作最大的意义,是对那些尚未被发现的人类经验,进行一次彻底地发现。只有具备这样的前瞻性,才能真正写出准确回应当下时代的作品。

